

论青海河南蒙旗文化变迁的影响因素

艾丽曼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地理环境的制约, 藏传佛教的信仰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河南县蒙古族在语言、服饰、饮食、习俗等方面已经发生很大改变, 与当地藏族基本相似。本文对影响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文化变迁原因作了分析。

[关键词] 河南蒙旗; 文化变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02(2009)01-0076-04

一、研究对象及背景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也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发祥地之一。青海蒙古族主要聚居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区。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唯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俗称河南蒙旗。全县总面积 6997.45 平方公里, 辖优干宁镇、宁木特、托叶玛、赛尔龙、多松、柯生、智后茂一镇六乡。2006 年总人口 33833 人, 其中蒙古族 31438 人, 汉族 975 人, 藏族 823 人, 回族 301 人, 土族 235 人, 撒拉 21 人, 保安 18 人, 裕固 5 人, 东乡 4 人, 维吾尔、满等其他民族 13 人。^[1] 河南县东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碌曲县, 南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 西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和海南州同德县毗连, 北邻泽库县, 在地理分布上处于藏多蒙少的格局, 因此受藏文化影响很大, 是蒙、藏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区。

河南蒙古族先民主要为 13 世纪元朝军队的土默特达尔吾部, 明朝的土默特火落赤部, 还有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及土尔扈特部。公元 1257 年, 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南宋, 土默特达尔吾部

由甘肃南部进发, 在河曲卓格浪(今甘肃省玛曲县、四川省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部)设立驿站和马场, 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定居下来, 成为当地最早的蒙古族居民。明朝蒙古族第二次进入青海, 以土默特火落赤为首于公元 1588 年(明万历十六年)进驻捏贡川(今青海省同仁县、泽库县一带), 统辖河南地区。明末清初蒙古族第三次入驻青海, 这一时期的蒙古族主要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公元 1636 年(明崇祯九年), 原先驻牧在乌鲁木齐一带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突袭青海, 其第五子伊勒都齐之子达延博硕克图济农为加强统治从海北率部南迁, 自公元 1652 年(清顺治九年)历经十多年到达河南地区, 并将原先驻牧在这一带的土默特达尔吾部、土默特火落赤部并作自己的部众。^[2]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 1725 年清朝把青海蒙古族收为内藩, 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 即和硕特前首旗、南右中旗、南左中旗和土尔扈特南前旗。河南蒙古由强盛走向衰落, 民族文化也受到极大影响。

二、变迁原因

随着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几次入驻青海, 蒙古

[收稿日期] 2008-12-12

[基金项目] 中山大学“中国田野调查基金”

[作者简介] 艾丽曼(1973-), 女, 蒙古族, 新疆伊犁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

族曾经辉煌一时。元朝灭亡后,蒙古族的势力日渐衰微,人口日渐减少。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地理环境的制约及宗教等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河南县蒙古族文化发生很大改变。河南蒙古族先民在初入河南地区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后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蒙古上层人士开始大力倡导学习使用藏语文,以期利用藏族势力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藏语文的学习带来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天长日久蒙古文化的特征逐渐消褪,藏文化取而代之成为河南蒙旗的主流文化,藏文化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渗透到蒙古人的思想意识中,加速民族文化的变迁,然而蒙古文化痕迹的遗存依然可见。

从语言来看,河南县使用的藏语夹杂有蒙语词汇的痕迹,具有不同于其它藏语的地方特色,反映了蒙藏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历史轨迹。据文献记载“1912年官方文书还在使用蒙古文”。^[3]现在河南县的蒙古族绝大多数已完全不通晓蒙文,仅有柯生乡和赛尔龙乡的极少数蒙古人使用含有大量藏语词汇的蒙古语。据20世纪90年代的一次统计,河南县当前能够使用蒙古语的约有500人左右,能够听懂蒙古语的约有1500-2000人,约占全县总人口的10%。^[4]当地蒙古族使用的藏语是一种从蒙古语转向藏语的方言,于周围地区的藏语相比有自身明显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河南县开始恢复蒙古语的学习,但最终失败告终。从服饰来看,蒙古族在初入河曲地区时仍然穿传统的蒙古袍,但到公元1806年左右(清嘉庆初年),当地蒙古族百姓的服装已与藏族服装基本相同。西宁办事大臣那彦成在其奏议中曾说:“蒙古竟有穿戴番子衣帽毫无差别着”,^[5]清政府曾经多次“正蒙古衣冠,以防诡混”,但仍未从根本上起到作用。解放后柯生乡和赛尔龙乡部分妇女在服装上还保留有蒙古袍大圆领、马蹄袖的特征,赛尔龙乡部分男子还穿“苏乎拉木”的蒙式靴子,现在河南县蒙古族在服饰上与藏族已无多大区别。在饮食上蒙古族也逐渐吸收了当地藏族的饮食习惯,糌粑、曲拉、酥油、青稞炒面成为蒙古族餐桌上的主要食品。丧葬形式河南蒙古同当地藏族一样以天葬为主,婚姻习惯既不完全同于藏族,也不完全同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具有自身明显的特色。

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基础和共同的宗教信仰,蒙藏民族之间在蒙古汗国建立特别是西藏归属元朝后,在近千年的发展史中从诸方面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最终走上宗教信仰一体化的道路,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又推动蒙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河南蒙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开始了自身的文化变迁旅程,“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改变。”^[6]文化变迁现象是复杂的,导致文化变迁的原因也是多样的,河南县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宗教信仰的一致

早期的蒙古人信奉的是北方大部分游牧民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相信万物有灵,腾格里(长生天)是主宰一切的权威。在蒙古族的发展历程中,萨满教曾一度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在蒙古帝国疆域的不断扩展下,蒙古统治者接触到与自己不同的各种宗教信仰,有着远见卓识的成吉思汗并没有采取排斥和打击的策略,而是实行了“兼容并包”的宗教政策,“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7]在不同时期蒙古统治者应自身需要对不同宗教有所侧重,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都曾得到蒙古汗国的扶持,成吉思汗家族中也允许信仰不同宗教,有的蒙古上层人士甚至改信当地宗教。

佛教于公元7世纪左右传到西藏,与藏族原始宗教本教相互斗争融合,形成了具有雪域高原特色的藏传佛教。公元13世纪在对吐蕃的征服过程中,成吉思汗之子阔端恪守“兼容并包”的国策,放弃武力而采取了宗教攻势策略,于公元1247年邀请当时在藏地颇有名望的佛教名僧萨迦班智达在凉州(武威)会晤,这一历史性事件掀开了藏传佛教向蒙古传播的序幕。阔端皈依藏传佛教,利用萨迦派的势力巩固对西藏的统治,以后历代蒙古统治者都继承和发展了阔端对西藏的统治方略。忽必烈统治时期尊奉萨迦班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赋予其宗教领袖和政治官员的双重身份。在这期间,蒙藏之间的关系不断加强和巩固,这种政教联盟的特殊关系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的蒙藏社会。明中叶,势力强盛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占据青海,邀请西藏格鲁

派索南嘉措活佛相见,并于1574年在青海湖畔建寺,隆重迎接索南嘉措活佛。这一蒙藏历史上的关键会见后,佛教在蒙古开始全面传播。清朝时期为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清政府大兴藏传佛教“以安蒙古”。宗教信仰的一致性推动了蒙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蒙古族经历了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倾斜历程后,最终走向了与藏传佛教融为一体的道路,藏传佛教在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影响。“政治上,蒙古征服吐蕃;而在宗教上,却为吐蕃所征服,并且长期影响蒙古社会的历史发展。”^[8]

蒙古族黄金家族的举措自然被蒙古贵族阶层和普通百姓奉为圣旨积极效仿。地方蒙古贵族极力与宗教人士靠拢,以期拓展自己的势力,筹建寺院和联姻成为主要手段。河南亲王及当地部落头人出资先后建有拉卜愣寺、拉卡寺、达参寺、曲格寺、香扎寺、郎木寺、拉家寺、石藏寺,这些寺院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与历代亲王关系密切。公元1709年(康熙48年)河南亲王察罕丹金出资迎请一世活佛嘉木样协巴多吉,在甘肃夏河县建拉卜愣寺,在之后的发展中融入了以拉卜愣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河南蒙古亲王郡王都重视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学习藏语藏文,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亲王旺舒克又选派50名蒙古族青年为该寺主持坚赞僧格僧徒。当时的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入寺为僧必须学习藏经藏文,众多僧侣又必然对藏语文的学习和运用起到推动作用。在藏语文得以大力推广的同时,蒙古语文的使用必然受到影响。宗教信仰对河南蒙古的藏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周边环境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看,河南蒙古族处于甘青藏族的包围中,内部又同藏族阿柔部落长期杂居,极易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藏族为青海的世居民族,13世纪蒙古族进驻青海后,为了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巩固自身实力,积极与周边占文化优势的藏族接触,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较多地借用了藏族文化成分。1723年清廷实行“盟旗制度”后,河南各旗只能在本旗范围内活动,河南蒙古逐渐失去与其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在长期封闭的状态中,逐渐远离自己的文化融入了藏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

(三)族际通婚

蒙古族实行严格的氏族外婚制,不允许在同祖先的近亲部落里互相娶聘,必须与无血缘关系的氏族通婚。蒙古族在入驻青海后,因为严禁氏族内婚,本民族人口又稀少,只能考虑与周边其他民族通婚以保证人口的繁衍。辛普森(Simpson)和英格尔(Yinger)在《种族和文化的少数群体:偏见和歧视的分析》一书认为,大规模的族际通婚一般不可能发生在存在严重偏见和歧视的族群之间。藏族和蒙古族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和游牧经济基础。河南蒙旗历代亲王中有四个娶了藏族夫人,历代河南亲王和嘉木样活佛保持了几世的家族联姻。史料记载,河南二世亲王旺舒克,系察罕丹津胞兄墨尔根诺颜之子拉察布与七世达赖喇嘛之妹嘉措卓玛所生。四世亲王纳罕达尔济,娶二世嘉木样的妹妹仁增杭毛为妻,生一子达什忠鼎即五世亲王。达什忠鼎娶了二世嘉木样的侄女为妻。八世亲王巴勒珠尔喇布坦,与四世嘉木样胞姐之女滇吉环仲结为伉俪,后来因滇吉环仲无嗣,又迎娶其妹兰曼措,生有一男两女,即第九、十世亲王。十世亲王扎西才让嫁于五世嘉木样长兄黄正清之子黄文源。^[9]上层人士的通婚起了典范作用,民间百姓普遍效仿与藏族通婚。

(四)蒙藏精英人士的广泛接触

一个社会中精英人物的举措往往对社会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并影响民间百姓。蒙藏精英人士的积极接触极大地影响了民间的广泛交往,对两种文化的交流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和藏族就存在局部性的接触,蒙藏之间已经对彼此情况有了初步了解,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同藏族政教界上层人物的积极接触,对蒙藏关系的确立起了特殊的作用。13世纪阔端王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凉州会谈,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六盘山会晤,成为蒙藏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元朝灭亡后,蒙藏之间的交往受到影响,为了各自的利益,蒙藏领导人再次联手。公元1578年,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领袖索南嘉措与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仰华寺会面,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开辟了蒙藏关系的新纪元。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身体力行迅速地推动了蒙藏之间的交流。蒙古族在入驻青海后,蒙古族上层人士积极接受占优势的藏族文化,历代河

南亲王与拉卜楞寺嘉木样活佛保持友好关系,乾隆年间,河南亲王旺舒克从西藏请了一百多位藏文学者,从事王府文职和藏文教学。

(五)蒙古族人口的锐减

蒙古族人口随着蒙古族势力的盛衰经历了迅速增加到直线下降的过程。蒙古汗国建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战争的扩大,蒙古地区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展,经济生活得以改善,为人口繁衍提供有利条件。许多被征服的民族也融入到蒙古族的共同体中,蒙古族人口迅速增加。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时人口约150万,至14世纪初约有四五百万人,达到蒙古族人口发展的最高峰。^[10]元朝灭亡后,蒙古族退居漠北,日渐衰微。清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事件的失败给青海蒙古族带来巨大影响。清廷采纳年羹尧《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奏议,将青海蒙古收为内番,在蒙古族地区实行“盟旗制度”,规定各旗只能在本旗范围内活动,使蒙古各部难以形成整体。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和硕特前首旗,南右中旗、南左中旗和

土尔扈特南前旗,各旗不得相互统属。在不断的内外战争中,蒙古族人口大量死亡、外迁,社会经济逐渐衰敝,蒙旗内部矛盾日增。内忧外患的状况导致河南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蒙古社会经济也受到严重摧残,贫困至极。

三、结语

“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一是内部的,由社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二是外部的,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与其他民族的接触、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当环境发生变化,社会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时,便开始发生变迁,而这种方式被这一民族的有足够数量的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它的特点以后,就可以认为文化已发生了变迁。”^[14]河南蒙古族的文化变迁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渐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当两个民族彼此的差异消失后,民族间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接近,族际间的交往增多,文化的变更也随之加快。河南蒙古族虽然外在的文化要素发生改变,但仍然保持对本民族的族属认同和情感联系。

[参考文献]

- [1] 青海年鉴 2007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 [2]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8- 10
- [3] [4]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方志编委会. 河南县志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906, 909
- [5] (清)那彦成. 那彦成青海奏议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7, 70
- [6] [14]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 209, 211.
- [7]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 [M]. 何高济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73
- [8] [10] 孟广耀. 蒙古民族通史(第一卷) [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2, 423, 371- 378
- [9] 丹曲. 藏族史料中的青海和硕特——蒙古黄河南前首旗亲王史略 [J]. 西藏研究, 1992 (2).

Analysis of the Culture Change Factor of Henan Mongolian Banner in Qinghai

AILI-m a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Henan Mongolian Autonomous County located in Huang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The Henan Mongolian culture had changed for different reasons such as social environment, geography environment, Tibetan Buddhism and so on, now their language, costume, diet, custom changed same as Tibetan. The article analysis the influencing factor of Henan Mongolian culture changed.

Key words Henan Mongolian Banner; culture change; influencing factor